

学生版

主编：王为国

# 传世 经典

CHUAN SHI JING DIAN

13



红旗出版社

13

传世经典  
学生版

红旗出版社

## 公车上书 ——康有为

### 【题解】

康有为（公元 1858—公元 1927 年），原名祖诒，字广厦，号长素，广东南海人。从十七岁到二十岁受学于名儒朱次琦，重视“经世致用”之学。1879 年游历香港，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，深受触动。从此，购西书，研究西学，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历程。1888 年 10 月，鉴于民族危机严重，第一次上书光绪帝，提出变成法、通下情、慎左右等系统的政治改革主张，但由于受顽固派阻挠，上书未达光绪之手。1889 年底回到广东。1890 年到 1893 年在广州长兴里万木草堂聚徒讲学，致力于变法理论的阐述，完成了《新学伪经考》，并开始编写《孔子改制考》，这两部书是康有为变法理论的代表作。1895 年中日《马关条约》签订时，他正在北京参加会试，随即联络同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，上书光绪，提出拒和、迁都、练兵、变法的救亡维新主张。随后，会试发榜，他中进士，授工部主事，但他未到职，而是继续上书皇帝。同时，在北京组织强学会，创办《中外纪闻》，随后又在上海设

立分会，出版上海《强学报》，推动各地组织学会、设立学堂、报馆，致力于变法的舆论鼓吹工作。1898年初，奉光绪之令上《应诏统筹全局折》，提出“大誓君臣以定国是，立对策所以征贤才，开制度局以定新制”的变法纲领。同年4月，在北京发起成立“保国会”，提出以“保国、保种、保教”为宗旨。6月11日，光绪接受他的建议，诏定国是，宣布变法，戊戌维新运动走向高潮。6月16日，康有为被光绪召见，奉命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，并可专折奏事。在百日维新期间，他连续上折，对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教诸方面都提出改革建议，全力策划新政。9月，戊戌政变发生，他被通缉。政变发生前一日他离京南下，后在英、日等帮助下辗转香港、日本、加拿大等地。逃亡国外期间，于1899年成立“保皇会”，仍坚持改良主义政治主张，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。辛亥革命后主办《不忍》杂志，宣扬孔教，反对资产阶级民主，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。1917年，和张勋策划清帝复辟。复辟失败后在美国帮助下逃出北京。其著作主要有《新学伪经考》、《孔子改制考》、《戊戌奏稿》、《大同书》、《康南海先生诗集》等。

本篇(选自《皇朝经世文三编》卷十六)是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要求朝廷拒签和约、变法图强的上书。1895年，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失败后，派李鸿章赴日本谈判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，而条约的部

分内容在签字的前两天传回国内，一时朝野上下舆论哗然，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反对。当时正逢会试在京举行，4月22日，广东、湖南两省举人共同向朝廷呈递了拒和请愿书，粤、湘两省举人的行动，立即影响了其他省份的举人，他们也愤然上书，并排队连日到都察院门前请愿。康有为用一天两夜的时间赶写好了一篇洋洋万余言的“上皇帝书”。5月2日，十八省的举人在松筠庵开会，宣读并通过了这篇上书，一千三百余人在上书上签名。随后，举人们将上书呈送都察院，请其转呈光绪皇帝。因汉代以后多以“公车”作为举人的代称，所以，这次上书便被称为“公车上书”。上书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，力主拒绝议和，明定对策，并提出四项解决问题的办法：“下诏鼓天下之气，迁都定天下之本，练兵强天下之势，变法成天下之治”。上书认为前三项都是挽救危亡的权宜之计，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之策。这次上书虽然未上达光绪，但却在民间得到广泛流传，冲破了清政府对于“士人干政”的禁令，提出了维新改良的纲领，是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思潮发展成为政治运动的起点。

### 【原文】

具呈举人康祖诒等，为安危大计，乞下明诏，行大赏罚，迁都练兵，变通新法，以塞和款而拒外夷，保疆土而延国命，呈请代奏事：

窃闻与日本议和，有割奉天沿边及台湾一省，补兵饷二万万两及通商苏、杭，听机器洋货流行于内地，免其厘税等款，此外尚有缴械、献俘、迁民之说。阅《上海新报》，天下震动；闻举国廷诤<sup>[1]</sup>，都人惶骇。又闻台湾臣民不敢奉诏，思戴本朝。人心之固，斯诚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，涵濡煦覆，数百年而得此。然伏下风数日，换约期迫矣，犹未闻明诏赫然，峻拒日夷之求，严正议臣之罪。甘忍大辱，委弃其民，以列圣艰难缔构而得之，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，如列祖列宗何？如天下臣民何？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，岂忍上负宗庙，下弃其民哉？良由误于议臣之言，以谓京师为重，边省为轻，割地则都畿能保，不割则都畿震动，故苟从权宜，忍于割弃也。又以群议纷纭，虽力摈和议，而保全大局终无把握。不若隐忍求和、犹苟延旦夕也。又以为和议成后，可十数年无事，如庚申以后也。左右贵近，论率如此，故盈廷之言，虽切而不入，议臣之说，虽辱而易行，所以甘于割地弃民而不顾也。

窃以为弃台之事小，散天下民之事大，割地之事小，亡国之事大，社稷安危在此一举。（举人）等栋折榱（音催cūi）坏<sup>[2]</sup>，同受倾压，故不避斧钺之诛，犯冒越之罪，统筹大局，为我皇上陈之。

何以谓弃台民即散天下也？天下以为，吾戴朝廷，而朝廷可弃台民，即可弃我，一旦有事，次第割弃，

终难保为大清国之民矣。民心先离，将有土崩瓦解<sup>(3)</sup>之患，《春秋》书“梁亡”<sup>(4)</sup>者，梁未亡也，谓自弃其民同于亡也。故谓弃台民之事小，散天下民之事大。日本之于台湾，未加一矢，大言恫喝，全岛已割，诸夷以中国之易欺也。法人将问滇、桂，英人将问藏、粤，俄人将问新疆，德、奥、意、日<sup>(5)</sup>、葡、荷皆狡焉思启。有一不与，皆日本也，都畿必惊；若皆应所求，则自啖其肉，手足腹心，应时尽矣，仅存元首，岂能生存？且行省已尽，何以为都畿哉？故谓割地之事小，亡国之事大。此理至浅，童愚可知。而以议臣老成，乃谓割地以保都畿，此敢于欺皇上、愚天下也！此中国所痛哭、日本所阴喜，而诸夷所窃笑者也！

诸国知吾专以保都畿为事，皆将阳为恐吓都畿而阴窥边省，其来必速。日本所为日日扬言攻都城，而卒无一炮震于大沽者，盖深得吾情也。恐诸国之速以日本为师也，是我以割地而鼓舞其来也。皇上试召主割地议和之臣，以此诘之，度诸臣必不敢保他夷之不来，而都畿之不震也。则今之议割地弃民何为乎？皇上亦可以翻然独断矣。或以为庚申和后二十年，乃有甲申之役<sup>(6)</sup>，二十年中国可图自强。今虽割弃，徐图补救。此又敢以美言欺皇上、卖天下者也。

夫治天下者势也。可静而不可动。如箭之在栝（音瓜）<sup>(7)</sup>，如马之在埒（音劣 lié）<sup>(8)</sup>，如决堰跛之水，如运高山之石，稍有发动，不可禁压。当其无事，

相视莫敢发难，当其更变，朽株尽可为患。昔者辛巳以前，吾属国无恙也。自日本灭琉球<sup>(9)</sup>，吾不敢问，于是法取越南，英灭缅甸，朝鲜通商，而暹（音仙 xiān）罗<sup>(10)</sup>半翦。不过三四年间，而吾属国尽矣。甲午以前，吾内地无恙也，今东边及台湾一割，法窥滇、桂，英窥滇、粤及西藏，俄窥新疆及吉林、黑龙江，必接踵而来，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<sup>(11)</sup>哉？况数十国逐于后乎！譬大病后，元气既弱，外邪易侵，变症百作，岂与同治之时，吾国势尤盛，外夷窥伺情形未洽比哉！且民心既解，散勇无归，外患内讧，祸在旦夕，而欲苟借和款，求安目前，亡无日矣！今乃始基耳。证脉俱见，不待卢扁<sup>(12)</sup>。此（举人）等所为日夜忧惧，不憚僭越，而谋及大计也。

夫言战者固结民心，力筹大局，可以图存；言和者解散民体，鼓舞夷心，更速其亡。以皇上圣明，反复讲辩，孰利孰害，孰得孰失，必当独断圣衷，翻然变计者。不揣狂愚，统筹大计，近之为可和可战，而必不致割地弃民之策；远之为可富可强，而断无敌国外患之来。伏乞皇上下诏鼓天下之气，迁都定天下之本，练兵强天下之势，变法成天下之治而已。

何谓鼓天下之气也？天下之为物，譬犹器也，用其法而弃陈，病乃不存。水积为淤，流则不腐；户闭必坏，枢则不蠹；炮烧则晶莹，久置则生锈；体动则强健，久卧则委弱。况天下大器，日摩洗振刮，忧恐尘垢，置

而不用，坏废放失，日趋于弊而已。今中国人民咸怀忠义之心，非不可用也。而将吏贪懦，兵士怯弱，乃至闻风哗溃，驯至辱国请和者，得无皇上未有以鼓其气耶？是有四万万之民而不善用之也。伏念世祖章皇帝<sup>[13]</sup>手定天下，开创之圣人也。而顺治十八年中，责躬之诏屡下。穆宗毅皇帝<sup>[14]</sup>手定艰难，中兴<sup>[15]</sup>之盛功也，而同治元二年间罪己之诏<sup>[16]</sup>至切。天下臣民伏读感泣，踊跃愤发，然后知列圣创定之功所由来也。《传》谓“禹、汤<sup>[17]</sup>罪己，兴也勃焉。”唐臣陆贽<sup>[18]</sup>谓：“以言感人，所感已浅，言犹不善，人谁肯怀？”今日本内犯，震我盛京，执事不力，丧师失地，几惊陵寝，列圣怨恫。皇上为人子孙，岂无有震动厥心者乎？然于今经年，未闻有罪己之诏，责躬咎厉，此枢臣辅导之罪，宜天下有望于皇上也。

伏乞皇上近法列圣，远法禹汤，特下明诏，责躬罪己，深痛切至，激励天下，同雪国耻，使忠臣义士，读之而流涕愤发；骄将懦卒，读之而感愧忸怩，士气耸动，慷慨效死。人怀怒心，如报私仇。然后皇上用其方新之气，奔走驰驱，可使赴汤蹈火<sup>[19]</sup>，而岂有闻风哗溃者哉？此列圣善用其民之成效也，故罪己之诏宜下也。

皇上既赫然罪己，则凡辅佐不职，养成溃痈，蔽惑圣聪，主和辱国之枢臣；战阵不力，闻风逃溃，克扣军饷；丧师失地之将帅；与夫擅许割地，辱国通款之使

臣；调度非人，守御无备之疆吏，或明正典刑以寒其胆，或轻予褫（音尺 chǐ）革以蔽其辜，诏告天下，暴扬罪状。其余大僚尸位<sup>[20]</sup>，无补时艰者，咸令自陈，无妨贤路。庶几朝廷肃然，海内吐气，忭颂圣明，愿报国耻，此明罚之诏宜下也。

大奸既黜，典刑既正，然后悬赏功之格，为不次之擢。将帅若宋庆、依克唐阿，疆吏若张之洞、李秉衡<sup>[21]</sup>，谅山旧功若冯子材<sup>[22]</sup>，皆有天下之望，宜有以旌之，或内综枢柄，或外典畿疆，以鼓舞天下。夫循资格者，可以得庸谨，不可以得异材；用耆老者，可以为守常，不可以为济变。不敢言远者，请以近事言之。当同治初年，沈葆桢、李鸿章、韩超皆以道员擢为巡抚<sup>[23]</sup>；阎敬铭<sup>[24]</sup>则由臬司<sup>[25]</sup>擢抚山东；左宗棠则以举人部员赏三品卿，督办军务；刘蓉<sup>[26]</sup>且以诸生<sup>[27]</sup>擢四川藩司<sup>[28]</sup>，逾月授陕西巡抚；用能各展材力，克佐中兴。若汉武帝之用才，明太祖之任吏，皆用不次之拔擢，不测之刑威，用能奔走人才，克成功业。伏读《世祖章皇帝圣训》<sup>[29]</sup>，屡诏天下之才，下至山林隐逸、举贡生监<sup>[30]</sup>、佐贰<sup>[31]</sup>杂职，皆引见擢用，此诚圣主鼓舞天下之盛心也。今日变甚急，天下未为乏才，而未闻明诏有求才之举，似非所以应非常之变也。夫有非常之事变，即有非常之才应之。同治中兴之臣率多草泽之士。宋臣苏轼<sup>[32]</sup>谓：智名勇功之人，必有以养

之。伏乞诏下九卿、翰詹、科道、督抚、两司<sup>[33]</sup>，各举所知，不论已仕未仕，引见擢用，随才器使。昔汉高之于樊噲<sup>[34]</sup>，每胜增其爵级；其于韩信<sup>[35]</sup>，一见即拜大将。凡有高才，不次拔擢，天下之士，既怀国耻，又感知遇，必咸致死力，以报皇上。故求才之诏宜下也。

夫人主所以驾驭天下者，爵赏刑罚也。赏罚不行，则无以作士气；赏罚颠倒，则必致离民心。今闻日本要我以释丧师之将，是欲以散众志而激民变也。苟三诏既下，赏罚得当，士气咸伸，天下必距跃鼓舞，奔走动容，以赴国家之急。所谓下诏鼓天下之气者此也。

何谓定天下之本也？自古都畿皆凭险阻，自非周公<sup>[36]</sup>盛德，不敢以洛邑<sup>[37]</sup>为都。故娄敬<sup>[38]</sup>挽辂，汉祖移驾。宋汴梁<sup>[39]</sup>无险，致敌长驱，徽、钦之辱<sup>[40]</sup>非独失德使然也。方今旅顺已失，威海既隳（音灰 huī），险阻无有，京师孤立。近自北塘、芦台、神堂、洞河，远自山海、抚宁、昌黎、乐亭、清河，蚕沙处处可入，无以为防守之计。此次和议即成，而诸邦窥伺，皆可扬帆而达津、沽。《易》曰：“王公设险，以守其国。”<sup>[41]</sup>险既失矣，国何可守？故今日大计，必在迁都。请以前事言之。我朝当道光之时，天下全盛。林则徐督粤，邓廷桢<sup>[42]</sup>督闽，叠败英酋璞鼎查<sup>[43]</sup>、额尔金<sup>[44]</sup>之兵。而移师天津，即开五口，偿二千万矣。其后道光二十九年、咸丰六年、咸丰八年，皆始战终和，藉京师以为

要挟，诸口益开，巨款累偿。暨庚申之变，我文宗显皇帝<sup>[45]</sup>至为热河之狩<sup>[46]</sup>，焚烧御园<sup>[47]</sup>，震惊宗庙。至今万寿山营缮虽新，余烬尚在。由是洋人掉臂都畿，知吾虚实。此事非远，皆诸臣所目击，前车易鉴者也。寻五十年来，吾大臣用事及清流<sup>[48]</sup>进议者，不深维始终，高谈战事，及震动津、沽，宫廷惶骇，则必以战无把握，输款求和。于是尸位无耻之流累借和议以容身。朝廷虽深知主战之直，必不见从；亦明知议和之非，俯徇所请。盖实患既至，非复空言所能抵塞。故外夷所累藉以胁制者，皆以吾京师近海之故。彼虽小丑，无求不得，吾虽大胜，终必请和，亦既彰明较著<sup>[49]</sup>矣。用事者既不早为自强之谋，又不预作迁都之计。夷衅既开，虚矫空谈，相与言战；及稍敷衄（音女nǚ），震动畏缩，苟幸得和，乃至割根本之地，弃千万之民而亦为之，其不智而失计亦甚矣。以今事言之，吾所以忍割地弃民者，为保都畿安乘舆<sup>[50]</sup>也。微论将来，外夷继轨，都畿终不能保，乘舆终必致惊。而以区区十里之城，弃千里之地、十兆之民以易之，甚非策也。以后事料之，诸夷知我之专保都畿也，咸借端开衅，阳攻都畿以索边省，我必将尽割沿边十余省以保都畿。是弃天下万里之地，数万万之民，以易区区之都城也。

夫王者有都以治天下耳，岂有割天下以保都城而恃为至计哉！以五十年来前后今事考之，吾之款和输割皆为都畿边海之故，其事易征，其理易明。昔者苟

能自强，虽不迁都，犹可立国。今日虽欲自强，而外夷连轨，计不及待。故非迁都，智者无所骋其谋，勇者无所竭其力，必将坐困胁割尽而后已。夫以一都城之故而亡其国，凯不痛哉！故今日犹言不迁都者，非至愚病狂，则甘心鬻国。大臣既不能预鉴于前，而至辱国；又不补救于后，必至丧邦。皇上圣明，试以诘难，诸臣当无从置喙；或下群臣集议，当亦从同。而后宸衷独断，定议迁都，以安宗庙而保疆土，无逾于此。或谓我能往。寇亦能往。我迁都以避，寇深入以争。自古迁都之谋。皆遂为偏安之计，此明臣于谦所以力争<sup>[51]</sup>而庚申所以止议也。不知古今异形，今昔殊势。外夷政由议院，爱惜民命，用兵甚慎，不敢深入，与古不同。今日日本用兵，已可概见。我既迁都，可以力战。虽沿边廓烂，而朝廷深固，不为震慑，即无所胁制，主和者无所容其身，主战者得以激其气。岂不鉴于五十年事而尚以为孤注哉？独不畏微、钦之辱乎？

或谓国君有死社稷之义<sup>[52]</sup>，此尤不达经义之瞽（音卫 wèi）言。夫国君者，诸侯之谓。以社稷受之天子，当死守之，犹今地方有司，有城池之责比耳。若天子以天下为家，四方皆可建都立社，何一城之为？明庄烈帝<sup>[53]</sup>既为迁儒所误，明社遂屋，岂可复以此误我国家哉？且一朝而有数都，自古为然。商凡七迁，周营三邑，汉室二京，唐世两都<sup>[54]</sup>，及明祖定鼎金陵，永

乐乃迁薊燕<sup>[55]</sup>，以太子留守南京，宫殿官僚悉仍旧制，择有司扈从，行在、庙社、官署，随时增修，永分两京，可以为法。若夫建都之地，北出热河、辽沈，则更迫强敌；南入汴梁、金陵则非控天险；入蜀则太深；都晋则太近；天府之腴，崤函<sup>[56]</sup>之固，莫如秦中。近虽水利不开，漕运难至，然都畿既建，百货自归。若藉机器、督散军，亦何水利不开哉？

夫京都建自辽、金，大于元、明，迄今千年，精华殆尽。近岁西山崩裂，屡年大水，城垣隳圮（音辉匹 huī pǐ），闾阎房屋倾坏无数。甚者太和正门、祈年法殿无故而灾<sup>[57]</sup>。疑其地气当已泄尽。王者顺天，革故鼎新<sup>[58]</sup>，当应天命，谓宜舍燕蓟之旧京，宅长安为行在。然人情乐于守常，难于移动。以盘庚迁殷<sup>[59]</sup>，诚谕至烦三诰；以魏文<sup>[60]</sup>迁洛，世臣犹有违言。盖世臣大家，辎重繁多，迁徙不易，听其变旧，庶免阻挠。自非大有为之君，不易破寻常之论。魏文南征，永乐北伐，皆借巡幸留而作都。皇上既讲明利害，远之防诸夷之联镳，近之拒日本之挟制，急断乃成。亟法汉高，即日移驾奉皇太后巡于陕西。六龙西幸<sup>[61]</sup>，万人欢庆。幸当讲和之时，民心稍静，择亲藩之望重者，留守旧京。车驾从容西狩，择百司扈从，以重兵拥卫，必不虑宵小<sup>[62]</sup>生心。日人虽欲轻兵相袭，数日乃抵津、沽，而我大兵云集都畿，犹可一战。彼岂敢深入内地，

飞越西天门潼关之险哉？然后扼守函潼，奠定丰镐<sup>[63]</sup>，建为行在，权宜营置，激励天下。妙选将才，总屯重兵，以二万万之费改充军饷。示之以虽百战百败，沿海靡烂，必不为和。日本既失胁制之术，即破旧京，不足轻重，必不来攻，都城可保。或俯就驾驭，不必割地，和议亦成。即使不成，可以言战矣。故谓迁都以定天下之本者，此也。

何谓强天下之势也？凡两物相交，必有外患。兽有爪牙之卫，人有甲胄之蔽。列国并立，兵者，国之甲胄也。昔战国之时，魏有武卒，齐有轻骑，秦有武士，楚庄<sup>[64]</sup>投袂，履及剑及<sup>[65]</sup>，即日伐宋。盖诸国并骋，无日不训讨军实，国乃可立。今环地球五十余国，而泰西争雄，皆以民为兵，大国练兵至百余万。选兵先以医生视其强弱，乃入学堂学习布阵、骑击、测量、绘图。其阵法、营垒、器械、枪炮日夕讲求，确有程度，操练如真战，平居如临敌。所由雄视海内也。日本步武其后，遂来侮我。而我犹守大一统之旧制以待之，不训兵备，至有割地款和之事。今日氛未已，不及精练，然能将卒相知，共其甘苦；器械精利，壮其胆气，亦可自用，选将购械，犹可成军。

夫用兵者，用其气也。老将富贵已足，无所愿望，或声色销铄，精气竭衰，暮气已深，万不能战。即或效忠，一死而已，丧师辱国，不可救矣。近者杨芳<sup>[66]</sup>失

律于粤城，鲍超<sup>[67]</sup>骄蹇于西蜀，令彼再如为兵时跳身坐炮眼上，岂可得哉？此赵惠<sup>[68]</sup>所以致疑于廉颇<sup>[69]</sup>，光武<sup>[70]</sup>所以不用马援<sup>[71]</sup>也。伏读《圣祖仁皇帝圣训》，亦以老将气衰不能用，此真圣人之远谋也。惟少年强力，贱卒怀赏，故敢轻万死以求一生。故选将之道，贵新不贵陈，用贱不用贵。且外夷战备日新，老将多恃旧效，昧于改图，故致无功。今请更练重兵，以待敌变。都畿根本至重，必有忠勇谋略、下士爱民之督抚如李秉衡之流者，专督畿辅之军，假令便宜。令其密选将才十人，不拘资格，各练十营，日夜训练，厉以忠义，激以国耻，择其精悍，优其饷糈（音许 xǔ），以为选锋。既有李克用<sup>[72]</sup>之义儿，李成梁<sup>[73]</sup>之家丁，缓急可恃。得此五万，都畿可守。再有将才，可以续练。前敌之宋庆、魏光焘<sup>[74]</sup>、李光久<sup>[75]</sup>，宿将之冯子材，并一时之望，可咨以将才，假以便宜，悉用选锋，厉以仇耻。沿边疆臣，亦宜选振作有为之人，不宜用衰老资格之旧，各选将才，各练精兵万人。并饬绅士各自团练。遇有警迫，坚壁清野<sup>[76]</sup>。并请敕下群臣，外至守令，传谕绅士有忠义沈毅慷慨知兵之士，不拘资格，悉令荐举，引用拔用，或交关内外军差遣。各县草泽中，皆有魁梧任气忠勇谋略之士，责令州县各荐一人。拔十得一，才不可胜用，必有干城<sup>[77]</sup>之选，足应国家之急者，是谓选将。

管子<sup>[78]</sup>谓：“器械不精，以卒予敌。”外国讲求枪炮，制作日新。枪则德有得来斯枪<sup>[79]</sup>、毛瑟枪<sup>[80]</sup>，法有沙士钵枪，英有亨利马梯尼枪，美有哈乞开司枪<sup>[81]</sup>、林明敦枪、秘薄马地尼枪<sup>[82]</sup>，俄有俾尔达奴枪。而近者英之黎姆斯枪<sup>[83]</sup>为尤精。炮自克虏伯炮、嘉立炮<sup>[84]</sup>外，近有毒烟开花炮、空气黄药大炮，以及暗炮台、水底自行船<sup>[85]</sup>、机器飞车、御敌戎衣、测量炮子表，巧制日新。日本步武泰西，亦能自制新器，曰苗也理枪。而我中国未能创制，只购旧式，经办委员不解制造，于坚、轻、远、准、速，无所谙晓，或以旧枪改充毛瑟，贪其价廉，乃不可用，其中饱者益无论。闻近来所购者，多暹罗废枪，香港以二两八钱购得，而中国以十二两购之。查同治十三年德之攻法，每分钟枪十余响，光绪三年俄之攻土，枪三十余枪，至日之犯我，枪乃六十余响。我师溃败，虽将士不力，亦器械不精，故胆气不壮有以致之。故吾非悬重赏以励新制不足取胜。今不及办，宜选精于制造、操守廉洁之士，专购英黎姆斯枪十数万以备前敌，并广购毒烟空气之炮、御敌之衣，庶器械精利，有恃无恐。是谓购械。

又我南洋<sup>[86]</sup>诸岛民四百万，虽久商异域，咸戴本朝，以丧师割地为外邦嘲笑，其怀愤怒过于内地之民，其人富实，巨万之资以数千计，通达夷情，咸思内归中国，团成一军，以雪国耻。特去天万里，无路自通。若派殷商，密令举办，派公忠智略通达商情之大臣领之，